

庫特·馮納古特及荒誕派小說

黃鐵池

相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荒诞、混乱、失去理性的世界，到处是恐怖、专制和疯狂，人类正陷入一个既无目标又乏意义的困境，无论是上帝还是英雄，不管是神学还是哲学都改变不了这样的状况……。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风靡一时的荒诞观。

作为荒诞派作家杰出的代表，约瑟夫·海勒、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库特·冯纳古特，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感受和非凡的文笔反映了时代重大题材，曲折、有力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危机和人们的异化心理，形成了当代美国文学中一股强有力的新潮流。

荒诞观的产生，有它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客观的社会因素，并非六十年代所首创。荒诞派作家多数接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警告，说我们正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失去自我，高度的科学技术日益使人们“官能化”和“操作化”。在文学上，他们直接受法国先锋派代表作家贝格特、尤奈斯库、格里叶等人的影响，把现实中种种黑暗、畸形、丑恶的事物“艺术地”予以渲染、夸张，使之荒诞化，有意把作品写得曲折离奇，晦涩难懂，矛盾重重。

在美国，荒诞观兴起的另一原因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荒诞概念在许多领域内被证实，“新逻辑”承认了它的不合逻辑性；现代科学否认因果关系和它的一致性概念，把混乱提高到科学事实的高度；最近，又有社会学家们提出我们是一群孤寂的人类集团在荒诞中成长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好象为荒诞观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但是，任何文学现象都是时代的产儿。当代那个喧嚣一片的西方社会是荒诞派文学产生的土壤。战争与冲突使人们看到了人类相互残杀的惨景，科学的高度发达，相应地预示着潜在的危机：在核阴影的威胁下，旧有的生活失去了意义；专制制度把人压成畸形；金钱可以绝对地改变人的命运……一切都似乎失去了理性。这样的形势，用欧文·豪的话来说“它无论对历史还是文学都意味着是一种极端的形势和彻底的瓦解”。

面对着西方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现状，许多作家认为文学不能再限制在揭露社会表面现象的范围内，“而应该阐述和研究混乱，复杂的意义，因为它在表面的掩盖下混淆了我们。”于是，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荒诞的题材几乎成了六十年代美国文学的标准，许多著名的评论家如伊哈布·哈桑、理查德·莱豪等不再提及那些五十年代评论界所注目的佼佼者如麦尔维尔、马克·吐温、威斯特、海明威等而随之转向。

(一)

荒诞派作家的题材几乎无所不包。他们怀着对现实世界深度的厌恶和绝望，独具只眼，采用了无逻辑、非理性的手法，熔严峻与诙谐，象征与暗喻于一炉，对种种可怕的事坚持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表现了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矛盾。

冯纳古特是这四位代表作家中年龄最大的，也是最荒诞的。他似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把一些胡思乱想中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东西凑在一起，组成怪异而荒唐的小说内容，来表现他那复杂的荒诞观。他曾经多次强调说，他小说的两个主题完全得自同胞兄姐的启示，他哥哥彼得·冯纳古特是一个爱开玩笑的科学家，他在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曾给冯纳古特写信说，“事实上，我现在只是处处在揩屁股”；他的姐姐身患癌症，临终前留下的遗言是“一无痛苦”。把这样两句话来概括他的主题看来似乎荒谬可笑，但冯纳古特却坚信他在这个世界里的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而已。

象大多数荒诞派作家一样，冯纳古特对战争题材特别敏感。作为上次大战中的一个战俘、十几万罹难者仅存的几个人之一的冯纳古特，对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始终心惊胆战。最使他触目惊心的是盟军用燃烧弹炸毁了德国不设防的文化古城德累斯顿。他亲眼看见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大火一过，全城一片废墟，尸骨如山。这场灾难常常使他不寒而颤，坐立不安。他那本最畅销的长篇小说《第五号屠场》中的许多情节，便可以看作是他在德累斯顿的亲身经历。这本小说把现实与幻想、控诉和祈祷、恐怖与爱情等结合起来。用自传体的形式把读者引到了当年德国的集中营。书中的主角比利几乎成了作者的影子，他整日忧心忡忡，把世界看成是一连串人们企图改变和理解它而又注定了失败的事件。因此，小说的基调是感伤的。甚至可以视为一本关于死亡的小说，每当有人在这第五号屠场中死去，冯纳古特总要写上句“归去了”，在短短一百八十六页的小说中，这句话竟用了一百多次。但是，作者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书中尤为明显。虽然冯纳古特曾经说，写一本反战小说犹如写一本反冰川小说一样无聊，而实际上他还是尽力地去揭露战争的残酷和纳粹的暴行。不但如此，冯纳古特还借比利远游宇宙中的另一个星球的情节来谴责地球上的一切战争。他把盟军参战喻之为中世纪的“儿童十字军”，是无知与野蛮的结合。他通过比利向该星球的人请教说，“请你告诉我你们的秘诀，这个星球怎么能和陆地相处，我要把它带回到地球上去，以拯救我们的同胞。”

与此同时，冯纳古特另一个主题也在此书中浓厚地表现出来，确切地说，“一无痛苦”也就是“无可奈何地屈从和忍受”。这样的思想，是他多年来对现实生活真切的感受，“上帝准予我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成了全书的祈祷词。在暴力面前，冯纳古特左思右想，反复斟酌，最后开给人们的药方却是逆来顺受。因此，书中的主人公比利在一连串骇人的遭遇中，德累斯顿被毁，身陷囹圄，飞机坠落，脑壳被砸，妻子莫名其妙地死于一氧化碳，直至自己最后被害，他还是为自己树了块墓碑：万事如意，一无受欺。

大概因为战争的残酷，特别是德累斯顿的大火对冯纳古特刺激太大，使他对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具有一种本能的害怕，他一直担心现代科学的成果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冯纳古特是尊重科学的，但他却再三提醒人们千万不要低估了科学的破坏力。他那本著名的小说《挑绷绷》便是这个观点的形象反映。

乔纳，书中的主角，“考虑到美国在广岛上投放第一枚原子弹的重要性”，决心写一篇真实的报道。他开始搜集原子弹之父霍尼克博士的第一手材料。乔纳不知道这位博士还发明

了“第九号冰”——无论它碰到什么，立即会把它冻起来。他因调查来到了圣·劳伦查岛，皈依了那里转忧为喜的宗教“伯克依”，但小说最后出现的高潮是“第九号冰”沾污了该岛的统治者，滑进海里，把整个地球冻成了冰块。

这本内容奇特交错，瞬息即变的小说完全可以当作抗议小说来读。他谴责了现代科学无视人民的利益，霍尼克只是热心于对人类的发明却把科学当儿戏。因此，我们可以说，冯纳古特对科学的发展抱着怀疑乃至悲观的态度，对人类的命运更怀不安。最使他担心的是，一旦这样的科学技术被寡人独夫所用，人们则肯定会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他的短篇小说《哈里逊·贝杰龙》就是这样生活的写照。

时间是2081年，到了那时候，人与人终于“平等”了，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谁也不比其他聪明或漂亮”。这种绝对的均衡倒不是生来如此，而是由于法律的规定和“优劣平均局”的高度警觉。宪法要求每个人的耳朵上戴上一只微型干扰器，每隔二十秒，它就发出刺耳的声音来打搅思路。这样，不管聪明与否，都不可能不公平地利用自己的智力。舞蹈演员身上要系吊锤，绑着沙袋，脸上要戴面具。于是，天下太平，一切安宁。

有人曾经把冯纳古特的小说按内容划为各种类型，但最终停止了这样的工作，原因是他作品的主题范围太广了，几乎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这些小说中，一个斑斑驳驳的西方社会隐约可见。在这到处是死亡、事故、神秘和忿恨的恐惧中，他始终坚持了人道主义的立场，特别致力于表现被那个社会制度所扭曲的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不但看到现在，而且还想到将来。应该说，这些作品的主题是严肃的。当然，毋庸讳言，冯纳古特的小说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糟粕，尤其是宿命论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几乎俯拾即是。他不相信一个人可能帮助别人或自己，宣扬人类缺乏统一的目标、意义和方向。在这充满了荒诞的世界里将四处碰壁。结果，他也和其他荒诞派作家一样，不再关心“生活应该做什么，而只是忍受罢了。”这不但构成了他第二个主题“一无痛苦”的思想基础，也与荒诞观的主要看法“人类的尊严取决于他在这毫无意义的现实面前无拘束地接受它，没有担心，没有幻想，而是嘲笑它”相合拍。现在的问题是，如此阴暗、荒诞的世界，应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嘲笑它呢？

(二)

冯纳古特被称为当代美国最杰出的荒诞派作家之一，如今已没有人再持异议了。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与其他三位代表作家不同，相比之下，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却一直未被学术界注意。直到1969年，还只有二篇专门研究他的论文，而其中一篇又发表在意大利（其他三人已有一百五十篇以上的专论），近几年来，这个问题本身也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甚至为此还展开了一场争论。有人认为，冯纳古特早年的小说都是些陈腐之作，缺乏二十世纪严肃作家所具有的那种“自我意识”，也有人认为他纯粹是一位科幻小说家，如一个唱滑稽的一样，不登大雅之堂。

但如果研究了冯纳古特三十年的创作思想及过程，特别是九部长篇小说和二本短篇小说集之后，我们不得不说这些看法都失之偏颇。很多人注意到，冯纳古特的科幻小说并不是那种异想天开，想入非非的胡编乱造。他更多地还是借用这种形式来评价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行动和思想，与其说是故事、小说，还不如说是隐喻和预言。因此，要真正寻找他久久未被注意的原因，恐怕还得从他独特而怪异的写作手法入手。

六十年代美国荒诞派作家并没有象欧洲先锋派作家那样完全无视传统技巧的影响。他们在各自的天地独辟蹊径，使用了幻觉、滑稽、模仿的手法，认为传统的悲剧形式已不敷使用，而喜剧却存在于怪诞之中，把喜剧的形式与揶揄、讽刺、笑话连在一起，就产生了所谓的“黑色幽默”，虽然几乎所有的荒诞派作家都不赞成把这样的桂冠套在他们头上，但他们作品的某些效果确实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毛骨悚然。这些作家一般都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情节内容的合理性，追求扑朔迷离的表现风格……而冯纳古特可谓青出于蓝，更翻进一层，他采用“全新的”手法，往往以科幻的形式，把现实和虚幻编织在一起，他认为这是他找到的一种最适宜表达自己世界观的形式，也即“距离观察法”，站在宇宙的高度来看世界，如同我们古代诗人李贺的诗“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一样。冯纳古特不但打破了空间观念，而且巧妙地运用了新的时间观。他那著名的“时间旅行法”可以随便地在故事中更换时间，其灵活程度使意识流作家望尘莫及。在他的小说中，时差几十年，距离亿万里，没有任何过渡与转折，互相穿插，毫无顾忌。把臆造的情节写得活龙活现，而真实的生活却又写得不甚可信。与此相配的是，他还喜欢写一些糊里糊涂的人物，让他们在与环境的冲突中，突出他那独特的见解。这种手法，现在已被学术界称之为“精神分裂症”手法。这与鲁迅先生借用了“狂人”的眼睛、思想和口气来表达他对“吃人的社会”的谴责和抨击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此同时，冯纳古特还把“双重性格”的描写强调到超过常人理解的范围。据称运用这样的写法，一是为了反对现实主义把人物当作一种模式来写，二是作者可以完全不顾正常人物悲欢离合的生活过程而随意安排他的角色和所作所为。因此，他书中的人物，看起来很不真实，矛盾百出，难以相信。

总之，冯纳古特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人物、语言等等都是稀奇古怪的，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让他人给混乱以秩序，我则给秩序以混乱”。这种文风难免影响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他的小说，象是一幅色彩浓烈的现代画，人们往往受它表面颜色的刺激而忘却了它所表现的主题。直到六十年代末期，随着美国社会内部反战情绪高涨、对荒诞派小说研究的深入和人们精神危机阴影的加深，冯纳古特的作品才象出土文物一样，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也博得了学术界的青睐，顿时名噪一时，蜚声文坛。

(三)

荒诞派小说在当代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它开了一代文风，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出现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巴思的《烟草径记人》及冯纳古特的《第五号屠场》等。虽然这些作品中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它们并没有粉饰生活，掩盖生活本质，而是在荒诞与幻觉之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实质和深刻的危机，是当代西方世界一个折光的反映。

当然，荒诞派作家不可能为人类的前途找到真正的方向。他们只是综合了一切现实社会中的阴暗面，既讽刺嘲笑却又无能为力。对病态社会的揭露是有力，但为它开的药方又是错误的。他们想拯救人类于泥淖里，但又好沉湎于自己的幻想之中。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梦魇和呓语中对西方社会的抨击和嘲笑，至少能引起人们对这样的制度产生永久的怀疑和不安。荒诞派小说不但统治了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坛，而且还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在当代世界文学的潮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值得研究的。